

# 盖茨在达沃斯为自家慈善求标准

■ 埃里克·凡纳尔/文

瑞士的达沃斯——有些人怀着期待鱼子酱的心来此地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但比尔·盖茨说自己会带木薯来。

“我不知道瑞士习俗怎么看这个。”微软主席兼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盖茨说。“我会把它放在一个精美的塑料袋之类的东西里。”

假设盖茨能让它成功过境，他拎起一袋木薯根——除少数健康的之外，大部分都烂了——给达沃斯设定标准，以衡量自己基金会对于消灭食物紧缺、作物枯萎地区饥饿问题的努力。

自2009年来，盖茨就发布年度公开信，详述其基金会的工作并提出来年的工作重点。今年，定于本周二在西雅图发布的公开信就强调了对农业改革的需求，目的是改善贫穷国家的营养状况。

盖茨基金会是世界最大的慈善组织，每年在农业项目上的捐资达3亿美元，超过其总收入的1/10。基金会大约一半的资金流向了健康医疗事业，包括与诸如艾滋病、小儿麻痹症、疟疾等疾病抗争所做出的努力，剩下的则献给了教育和其他新生行业。

去年，盖茨的公开信关注的是基金会对于疫苗的开发和普及所做出的努力。当盖茨基金会和其他组织在去年首次宣布印度已无一例小儿麻痹症病例上报时，新年伊始，顽抗致命疾病的战斗可谓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泰国农民急需木薯这种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新型作物。

艾格尼丝·德比/摄

利。

盖茨称，他今年决定关注农业，因为他认为农业一直未能获得重点关注。同时，他补充道，对食物的需求是很容易为公众所理解的，因为“民以食为天”。

“我对健康事业的投入获得了强烈的回应，”他在电话中说道。“但当我们表示农民种出更甜的番薯会含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时，获得的回应更强烈。”

公开信描述了坦桑尼亚农民的困境，他们的主食——木薯所感染的两种疾病同时侵害了叶和根，而根正是可食用部分。其实，木薯可用于制作多种食物，包括木薯粉。

“每天醒来后都为能否吃得饱担心的10亿地球人不会生活在达沃斯。”盖茨说。他补充道，基金会的目标是在十年后将此



饥饿人数减少一半，而此人数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进行计算。

盖茨常年出席论坛，基金会和微软在论坛上也是十分有话语权的。

在对饥饿问题的关注上，盖茨并不孤单。食品是国际领导人近年来召开的系列会议上的首要议程项目。在意大利亚桂拉，八国集团主要经济体代表人于2009年承诺，为未来三年出现的问题捐资200亿美元。

元。

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佐利克去年称，最近食品价格的上涨已成为去年席卷整个阿拉伯社会的不安定气氛的“催化因子”。

然而盖茨说，他担心的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对于资助的威胁。其他的担忧不断增多，比如欧元区危机和伊朗冲突威胁，都会掩盖更加基本的问题，比如将食物端上桌的需求。

从去年开始，根据八国集团报告，2009年在意大利承诺的资金总额，仅有大约1/5真正得以兑现。同样，盖茨先生说，他担心向全球基金承诺的用于抗争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资金远少于八国集团承诺的资助总额。

“现在资助面临的不确定形势确实很严峻，”盖茨说，“这才是真正的担忧。”

(据《纽约时报》王婉俊/译)

## 慈善：美国实力和雄心的一座灯塔

■ 约翰·加普/文

1956年，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在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文时，把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描述为“被一伙人团团围着的一大堆钱，这些人想从中得到一些”。

类似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这样的基金会，在美国社会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们的实力和雄心是对社会有益的，尽管福特基金会是避税的产物(为了逃避遗产税，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埃兹尔·福特(Edsel Ford)把他们的大部分股权遗赠给了家族基金会)。

这些基金会也广受羡慕——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向艾滋病和疟疾研究倾注了数亿美元，在其他国家再也找不到与之相当的机构。随着欧洲各国政府压缩教育拨款，欧洲大学对哈佛大学(Harvard)和斯坦福(Stanford)

这样的美国大学获得的捐赠羡慕不已。

这种“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最新表现是“风险慈善”(venture philanthropy)，或称“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它是一场由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其他一些亿万富翁领导的运动。他们提倡用一种试验性的、风险资本式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然而，奥利弗·聪茨(Olivier Zunz)极其注重细节的历史新著告诉我们，慈善创新并不新鲜。美国公民捐赠慈善事业的方式、私人慈善机构与政府政策互动的程度，一直在发生变化。

慈善家们已占据了美国社会政策的核心地位，并且在全世界散播他们的影响力。在不得不与他们合作、并苦恼于相关责任认定时，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并不总是感到高兴，但和1956年一样，金钱是万能的。

慈善还享有巨大的操控自

由，美国的慈善家们在19世纪晚期就为自己确定了这一原则。纽约的蒂尔登法(Tilden Act)和其他法律允许富人在将资金投入基金会时，无需具体说明如何运用，而是将决定权留给受托人。

人们或许会认为，像福特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这样的人物，会喜欢在去世后继续掌控一切，但19世纪“阴魂不散”的捐赠者败坏了这种做法的名声。聪茨列举了一个例子，在那个营养不良比肥胖更令人担心的时代，有人捐赠了一笔遗产，用于每餐为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女学生供应一只烤土豆。

美国慈善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社会中已变得非常普遍，并且根深蒂固。实际上，这个概念是由荷兰摄影师及社会活动家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从海外引入的，他在1904年听说一位丹麦邮政官员通过“一便士捐赠计划”，为患有肺结核的儿童

建立了一家医院。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刺激了大众的捐赠积极性。193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旧金山93%的有轨电车司机及其家人将收入的1.5%捐给穷人救济。基督教传统和社会压力的综合作用促进了这种“什一税”的传播。

直到不久以前，美国慈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面向国内的，美国人的教育和医疗是其主要目标，并且，对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程度，设置了一定的限制，尽管基金会在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一点在198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中发生了改变。当时里根(Reagan)政府不愿意通过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直接提供美国的援助，但由于受到电视中灾难镜头的触动，美国的基金会不顾这一点，独自采取了行动。盖茨基金会就是基于把美国慈善带到全世界的愿望而建立的。

这是一部学术历史书，更侧重于事实而不是笼统的评判，当聪茨探讨一个问题时，会让它保持探讨的状态。这样做有其优点，但在风险慈善的问题上，又有其局限，作为历史学家，他似乎有一种对新事件避免过多谈论的谨慎。

人们或许会逐渐淡忘，但盖茨慈善之举(现在得到沃伦·巴菲特的支持)的惊人规模和雄心，似乎值得人们赋予其更大的重要性。正如聪茨对19世纪的描述：“慈善项目体现了前所未有的慷慨和自大。新一代富人自由地畅想和设计公益事业，并且付诸实施。”

问题在于，面对国内的不公和失业问题，美国的基金会是否会转回国内，放弃全球慈善。它们会受到这样做的压力，但如果它们的全球雄心就此减弱，将是一种遗憾。

在人们对美国的实力和合法性逐渐失去信心的时代，这种慈善事业仍会是一座灯塔。

(据英国《金融时报》方舟/译)